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of Househol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Haoqi Song, Yanrong Zhang[†]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Email: zhangyr@gsau.edu.cn

Abstract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rural solid waste i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major task of realizing the "ecological livabl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LES2022, this paper take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rural household wast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dopts the binary ordered Logit model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decision-making.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two dimensions and four variables of trust positively affect the decision-making choices of househol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disposal to a large extent. The age of farmers, the perception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subjects and the situation of family members also affect the participation of househol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disposal to varying degrees.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proposes to expand farmers' social relations, improve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and enhance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household waste.

Keywords: Trust;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Household Waste; Farmer Participation

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影响*

宋豪琦, 张艳荣[†]

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重大任务的核心内容, 对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 CLES2022 的调研数据, 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为切入点, 采用二元有序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实证分析了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农户参与垃圾分类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 信任的两个维度四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正向影响农户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决策选择, 农户的年龄、环境责任主体感知程度及家庭成员的情况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建议通过扩展农民的社会关系, 健全乡村环保信息披露体系, 提高农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积极性。

关键词: 信任;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农户参与

引言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重大任务的核心内容, 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福祉, 是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1]。近年来, 国家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给予了极大的关

*基金资助: 受“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供给研究”支持资助 (GSAU-XKJS-2018-245)。

注，先后颁布了多项有关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行动计划，农户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程度改观，环境卫生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农村人居环境整体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地区环保设施历史欠账多，环保专项资金使用不规范等矛盾突出，离广大农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尚有很大距离。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基础性工程。与其它环境治理工作相比，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具有可操作性强，投资少，见效快等优势，广大群众在参与中更有获得感。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对于改善农村公共卫生环境、阻断疾病蔓延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关乎五亿农村人口的生计问题，也事关“和美乡村”的营造品质。推动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是解决我国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的重要抓手。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主要是从环境规制、主体责任和治理模式三个视角对环境治理进行探讨。就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行为而言，翁艺青等^[2]发现政府环境规制能促进农民环境治理积极性和提高农民环境治理意愿；唐林等^[3]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政策可以推动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工作，但是只有在农户家庭收入到达一定程度时，环境政策的积极作用才能逐步显现出来，且环境政策强度和农户环境行为之间呈“倒 U 型”关系。就主体责任认知如何作用于农户的环境治理行为而言，杨成钢、何兴邦^[4]发现，环境改善需求在个体环境行为中的有效性受农户环境责任感知程度的影响，而农户往往认为环境治理应该由政府、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买单”，普遍认为个人努力过于弱小，对整体环境的改善意义不大。谢秋山、彭远春^[5]研究发现，居民对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有自我避责趋势，出现了譬如过于注重“大环境”却忽略日常生活“小努力”“两体分离”等问题。就环境治理模式探索而言，张志胜^[6]指出，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地方政府牵头，地方企业、非政府组织、村委会和农户各利益相关方相互配合，“多元共治”；杜焱强^[7]等人研究发现，农村环境治理 PPP 模式对于解决农村环境治理失灵等多重困局大有可为，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在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在具体执行过程应谨慎进行。还有学者从关系网络，环境感知，付费意愿等不同视角，在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环境污染情境中，对公众参与治理的意愿与策略进行了分析。既考虑了环境治理中例如外部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等宏观因素，又兼顾了人力资本、声誉诉求等微观因素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

大量学者的研究明确表明社会资本显著影响环境治理成效，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社会资本理论得到了丰富和拓展，在对不同的主体进行评价时，其测量维度与具体指标存在显著区别，测量难度较高。有鉴于此，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选择非正式制度中的“信任”变量，并对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决策选择进行探讨，分析在新发展阶段，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对农户环境整治决策的影响机制。

1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说

关于信任的概念，涉及到的研究范围很广，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们也都从各个角度给出了关于信任的解释，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信任的通用概念。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信任是一种人格特征或判断、倾向；经济学从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把信任看作是一种理性的计算或制度性的因素；社会学从内嵌的视角将信任看作是一种高效的、简单的协作或利他行为。

最早的时候，人们把社会信任界定为“对将来某一时刻的期待”，并且认为这样的期待对于人们的行动和决定有很大的影响^[8]，福山^[9]则认为社会信任是“在一个团体中，每个人都希望彼此保持正常的，诚实的，合作的行为”，这两个概念本质上是相似的。社会信任包括很多层面：国外学者 Robert D.Putnam^[10]把信任分为依赖社会关系的厚信任与游离于社会联系之外的薄信任；James S.Coleman^[11]把信任分为带有亲密情感关系的人际信任与带有契约管控性质的制度信任；赵雪雁^[12]把信任分为“道义型”普遍信任与“约束型”制度信任。本研究中所称的社会信任，是指农户在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对他人在情感上的认同和与自身利益相一致的认可。在借鉴了其他学者研究成果后，选定 James S.Coleman 对信任分类的方法，将农户的社会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垃圾的分类处理的水平要得到显著提高，需要动员广大农户

集体努力才能取得更好效果。所以在“集体行动”视角下探究农户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决策十分必要。为解决“搭便车”现象和打破“囚徒”困境，社会信任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同时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由此促成农户对环境整治活动的参与^[13-15]。另一方面，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兼具正外部性，既有助于改善自身发展环境，又对和美乡村建设大有裨益。每户家庭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上的努力，对改进和维护乡村的生态环境均是有益的，也就是说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具有溢出效应。社会信任作为组成社会资本的局部，对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和价值规范具有指导作用。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研究重点探讨农户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决策选择，从而进一步考察社会信任对于农户参与环境整治的作用。

所谓人际信任，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在互动中所建立起来的，关于被互动者口头或者书面陈述是否可信的心理契约，一般是建立在宗族关系、血缘关系和邻里交往之上的，分为基于亲缘关系的对亲属的信任和基于地缘关系的对邻居的信任。在这一点上，对亲属的信赖是建立在交际对象与宗族血脉关系的近与远，而对亲密度不同的亲属，也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信任。与对亲戚的信任不同的是，邻里之间的信任，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对方的行动和态度为依据的。一些学者已经指出人际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环境治理参与决策，对农户的环境项目参与意愿、环保投资参与意愿和环境管护绩效亦有相同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农户对亲戚的信任对其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选择有正向的影响；

H2：农户对邻居的信任对其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选择有正向的影响；

所谓制度信任，是指社会成员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职合规性及法律保障公平性的心理期望，一般可以分为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和对相关制度的信任两种。制度环境对制度信任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制度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带动社会成员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规范的态度与行为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影响集体行动的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对基层干部的信任是以社会成员对其履职能力的期望为前提的，公众的决策选择和参与行为与对其的信任程度息息相关。村干部被依法赋予公权力，在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与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重要角色，村干部能否发挥好领头羊的作用，带领农村社区居民共同发展是获取村民信任的先决条件。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是一种制度信任，农民对村干部信任程度正向影响其参与环境整治决策的可能性。现有研究显示，制度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环境整治参与决策、环保投资参与意向和环境项目参与意向。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对其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选择有正向的影响；

H4：农户对本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的信任对其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选择有正向的影响。

2 数据来源、模型选择及变量解释

2.1 数据来源

为了考察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决策是否具有显著影响，本文采用南京农业大学开展的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hina Land Economic Survey, 简称 CLES)的实地调查资料。该调查采取PPS抽样方法抽取样本县(区)和行政村，受到疫情影响，2022年CLES完成了江苏省6个地级市12个县24个村的追踪调查。共收集农户问卷1203份，通过对样本数据的整理及筛选，在排除了信息不全、内容前后不一致的调查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1119份，问卷有效率为93.02%。

问卷的内容有：①受访村庄基本特征。78.26%的村庄位于平原地带，受访村庄村委会到县城的平均距离为19.52公里，三分之一的村庄被认定为经济薄弱村，县级以上文明村占比近七成。受访村均设有生活垃圾投放点，垃圾的清运任务主要是由村委会承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开支绝大部分由政府或村集体“买单”，仅有1个村庄采用村集体投入和村民自筹的方式支付相关费用。四分之三的受访村庄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主要靠政府或村委会推动，仅有五分之一的村庄的村民主动参与了垃圾分类。对于垃圾乱放、乱堆的情况，受访村均采取了相应的监督措施，20.83%的受访村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例如罚款的方式

进行监督，70.83%的受访村通过村规民约约束村民的不良生活行为，83.33%的受访村通过村干部或村委会委托人监督，超过六成的村庄通过“组合拳”的方式，多措并举监督村民乱堆乱放的行为。在对受访村村委会负责人进行访谈时发现，16.67%的村干部认为政府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重视程度还不够，超过五分之一的村干部认为环保技术落后制约了本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开展，超过三分之一的村干部认为本村的管理机制不健全，62.5%的村干部认为村民积极性不高制约了本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开展，同时村干部普遍认为投入到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资金缺口仍较大。政府和村干部仍是现阶段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回应村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也逐渐成为环境整治工作开展的主要动因。

②受访农户基本特征。农业生产和生活都是在家庭范围内完成的，户主的态度对家庭生活决策总体上具有决定性作用。本样本农户为户主或其配偶的有 1054 户，占比为 94.19%，其认知水平与行为决策能够代表该农户单元的整体水平。受访农户以男性为主，共 825 位，占比为 73.73%;受访人年龄偏大，平均年龄为 62.26 岁，65 岁以下的农户有 600 位，占比为 53.62%，这与常住人口以老年人为主的农村现状相吻合；受访人平均在校年数为 7.22 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户有 876 户，占比为 78.28%。

2.2 模型选择

本研究主要对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在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决策中的作用进行剖析，选择二分类变量“农户参加垃圾分类处理的情况（*ERWP*）”作为因变量，其值为 0 或者 1，选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对农户垃圾分类决策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理想的方法，并选取以下公式来预测农户采取垃圾分类行动的可能性。

$$\text{logit} \left(ERWP_i = 1 \right) = \alpha TR_i + \beta IND_i + \gamma HH_i + \delta PEPT + \lambda \tag{1}$$

在公式中，*ERWP* 表示农户参加环境整治的情况，如果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取 1，否则取 0；*TR* 表示农户的社会信任，*IND* 表示农户的个体特征，*HH* 表示农户的家庭特征，*PEPT* 表示农户的环境认知特征， λ 为常数，下标 *i* 表示第 *i* 个被调查农户。

2.3 变量解释

因变量：选取“农户参与垃圾分类的情况”为因变量。本文最终选取的用于确定农户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指标，是根据被调查农户对问卷中“您是否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Y)所作出的回答。样本分布见表 1。从表 1 可见，54.07%的农户已经实践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45.93%的农户还未付出行动，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积极性还不是太高。从样本分布地区看，南京市农户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践行率最高，占地区样本数的 88.54%，扬州市(35.98%)最低，受访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查阅资料发现，南京市政府办公厅在 2020 年 7 月发布了《关于印发南京市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京市通过改革垃圾投放、收运模式，创新垃圾分类方式，基本形成了完备的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垃圾分类体系，促进了区域内农户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认知能力的提升，进而提高了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热情。

表 1 不同地区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调查结果分布情况

地区	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未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农户数（个）	比例（%）	农户数（个）	比例（%）
南京市	170	88.54	22	11.46
淮安市	66	40.49	97	59.51
盐城市	110	57.89	80	42.11
扬州市	68	35.98	121	64.02

镇江市	81	41.33	115	58.67
泰州市	110	58.20	79	41.80
总计	605	54.07	514	45.93

自变量：自变量为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回归方程的右侧，TR 变量为可能影响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变量。本文对人际信任变量的选取包括对亲戚的信任(T1)、对邻居的信任(T2)；制度信任变量的选取包括对村干部的信任(T3)、对本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的信任(T4)。在实际分析中，在实际分析中，将 T1 转化为“我很信任亲戚，要是亲戚提议我去参加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工作，我会采纳的”，将 T2 转化为“我很信任邻居，要是邻居提议我去参加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工作，我会采纳的”，将 T3 转化为“我很信任村干部，要是村干部提议我去参加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工作，我会采纳的”，将 T4 转化为“我非常相信村里关于生活垃圾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如法律上要求参加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我会采纳的”。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选择农户个体特征，家庭基本情况以及其环境治理责任认知情况三个维度统筹考虑。其中农户个人特征由受访农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在校几年）、是否中共党员和是否兼业 5 个变量构成，农户家庭特征包括“家里有没有人当干部？”和“您觉得自己家庭在本地的经济地位如何？”2 个变量，环境认知特征包括“您认为您的家庭有责任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和放置吗？”和“您同意生活垃圾分类对农村环境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吗？”两个变量。变量定义及赋值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定义及赋值

变量	定义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农户环境 整治参与	是否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Y	1=是；0=否	0.54	0.50
人际信任	对亲戚的信任 T1		4.18	0.80
	对邻居的信任 T2	1=很不信任；2=比较不信任；3=一般； 4=比较信任；5=很信任	4.01	0.77
	对村干部的信任 T3		4.09	0.80
制度信任	对本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的信任 T4		3.88	0.88
个体特征	性别 I1	1=男；0=女	0.74	0.44
	年龄 I2	周岁	62.26	11.52
	文化程度（在校几年）I3	年数	7.19	4.21
	是否为中共党员 I4	1=是；0=否	0.21	0.41
	是否兼业 I5	1=是；0=否	0.37	0.48
家庭特征	家庭成员是否有人当干部 H1	1=是；0=否	0.18	0.39
	家庭经济地位 H2	1=非常低；2=比较低；3=一般；4=比较高；5=非常高	2.95	0.67
环境认知 特征	家庭有责任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和放置 C1	1=完全不负责；2=不负责；3=一般责任；4=部分责任；5=完全责任	4.08	0.90
	生活垃圾分类对农村环境改善起到积极作用 C2	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	4.26	0.91

3 结果及分析

在回归分析前，综合考虑了农户对于亲戚，邻居，村干部以及本村生活垃圾治理法律法规信任度等变量之间可能会产生内部相关，本研究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作为考察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指标。通常情况下，当 VIF 大于 3 时，各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共线性关系；在 VIF 大于 10 的情况下，各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利用 Stata17.0 统计分析软件，选取“对亲戚的信任(T1)”为被解释变量，剩余的变量为解释变量，藉以验证自变量的共线性。结果表明，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高为

1.416，因此该模型中的各个解释变量不会出现多重的共线性，能满足 Logistic 回归的要求。

表 3 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维度	变量	系数	Z 值	边际效应
人际信任	对亲戚的信任 T1	0.630***	4.409	12.507%***
	对邻居的信任 T2	0.258**	1.717	5.013%**
制度信任	对村干部的信任 T3	0.331**	2.441	6.007%**
	对本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的信任 T4	0.298***	3.792	5.065%***
个体特征	性别 I1	0.178*	1.117	15.039%*
	年龄 I2	-0.023***	-3.209	-0.005%***
	文化程度（在校几年）I3	0.034	1.784	0.587%
	是否为中共党员 I4	1.185	1.843	16.062%
	是否兼业 I5	1.146*	2.791	21.032%*
家庭特征	家庭成员是否有人当干部 H1	1.157*	1.799	15.834%*
	家庭经济地位 H2	0.589**	2.265	11.019%**
环境认知特征	家庭有责任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和放置 C1	0.419***	5.219	13.091%***
	生活垃圾分类对农村环境改善起到积极作用 C2	0.620*	3.593	11.882%
常数项		-2.692***	-3.341	—
Log likelihood		-104.682	—	—
LR chi 2 (13)		126.370	—	—
Prob > chi 2		0.000	—	—
Pseudo R2		0.367	—	—

注:表中*、**、***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 Z 值。

采用 Stata17.0 软件对样本进行 Logistic 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变量的边际效应进行了分析，以便于更好地了解各变量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程度。输出结果表明，T1、T2、T3、T4 四个变量边际效应都比较大。通过对该公式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出有关信任的 4 个变量均在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决策中发挥显著作用。

通过对边际效应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变量而言，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处置决策的影响均居于较高程度。社会信任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决策中的作用大小分别是：T1>T3>T4>T2，即对亲戚的信任度最高，其次为对村干部的信任，再次为对本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的信任，对邻居的信任相对于其他三个变量较低。农户对不同类型的群体、制度持有不同程度的信任，符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以个体为中心由亲至疏的“差序格局”^[16]。

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信任对农户参与环境整治工作有显著影响，得到如下结论：①近几年来，全球范围内关于生态与环保的讨论越来越多，同时我国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显著，相关的环境整治工作任重道远，建构农户间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成为新时代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项重要措施。②半数以上(54.07%)的农户有参与垃圾分类的意愿和行为，但是不同区域农户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差异比较明显。③农户之间的人际信任程度越高，他们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就越高。边际效益的大小顺序是对亲戚的信任高于对邻居的信任；农户制度信任水平的增强对其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热情亦有相应的鼓励，贡献度的大小顺序是对村干部的信任高于对本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的信任。社会信任两个维度四个

具体指标的贡献程度的大小顺序为对亲戚的信任、对村干部的信任、对本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的信任、对邻居的信任。④农户性别、兼业情况、家庭经济状况、环境责任认知、家庭成员是否为村干部或党员等因素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决策有亦不同程度的影响。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启示：①人际信任方面。政府部门的基层组织应致力于扩大农户的“信任半径”，通过组织广场舞大赛及其他文体活动、组建秧歌队及其他农村文化艺术社团，为农民参与垃圾分类活动搭建交流的平台、烘托良好的氛围，促进农户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合作、增强情感联系及信任程度，降低农民参与环境整治时“搭便车”等不良认知的影响，促使他们提升与垃圾分类工作的互动程度。②制度信任方面。健全农村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增加环保信息披露内容，例如动员农户成立负责本社区垃圾分类的工作小组、定期公开本社区环保资金的用途、规范基层干部的行为等。同时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与监督体系，因地制宜优化生态环境管护机制，发挥政府的号召力，畅通农户环境需求表达渠道，循序渐进引导农户参与垃圾分类工作，发挥基层工作人员“服务者”的角色，提升农户对政府、制度的信任水平，更好地促进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 [1] 杨娉,王政,王文娟,杜其光,张春元.提高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极性的研究——基于天津市涉农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06):113-116+194.
- [2] 翁艺青,黄森慰,黄可扬. 环境规制、农户意愿与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J]. 世界农业,2021,(11):81-90.
- [3] 唐林,罗小锋,张俊飏.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行政约束抑或是经济激励——基于鄂、赣、浙三省农户调研数据的考察[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06):147-157.
- [4] 杨成钢,何兴邦. 环境改善需求、环境责任认知和公众环境行为[J]. 财经论丛,2016,(08):96-104.
- [5] 谢秋山,彭远春. 政府、企业和公民:中国环境治理的责任困境[J]. 天府新论,2013,(05):91-99.
- [6] 张志胜.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6(01):201-210.
- [7] 杜焱强,刘平养,吴娜伟.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会成为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吗?——基于全国若干案例的现实检验[J]. 中国农村经济,2018,(12):67-82.
- [8] Deutsch M. 1958. Trust and Suspic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2(4):265~279.
- [9] Fukuyama F.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457.
- [10] Putnam R.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of social capital[J].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 6(1):65-78.
- [11] 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 [12] 赵雪雁. 村域社会资本与环境影响的关系——基于甘肃省村域调查数据[J]. 自然资源学报,2013,28(08):1318-1327.
- [13] Ostrom E, Calvert R, Eggertsson T.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 86(1): 279-249.
- [14] 罗伯特 D 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 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15] 贾蕊,陆迁. 不同灌溉技术条件下信贷约束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以甘肃张掖为例[J]. 资源科学,2017,39(04):756-765.
- [16]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作者简介】

¹ 宋豪琦（1998-），男，山西介休人，汉族，硕士研究生，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研究方向：农业管理。

² 张艳荣（1964-），女，河南沁阳人，汉族，教授、硕士生导师，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农村贫困问题。